

城市与社会丛书

夏 军 马西恒 主编

RENLEI HUIJU

YU XIANDAI WENMING

夏 军 马西恒等著

人类汇聚与现代社会文明

以上海模式为镜

学林出版社

本书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资助出版

城市与社会丛书

夏 军 马西恒 主编

人类汇聚与现代社会

——以“上海模式”为镜

夏 军 马西恒等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汇聚与现代文明：以上海模式为镜 / 夏军，马西恒等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5

(城市与社会丛书 / 夏军，马西恒主编)

ISBN 7-80730-128-7

I. 人... II. 夏... III. 文化—影响—城市化—研究—上海市 IV. F29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8750 号

人类汇聚与现代文明——以上海模式为镜



著 者 / 夏 军 马西恒等

责任编辑 / 吴伦仲

特约编辑 / 蔡才宝

责任监制 / 应黎声

封面设计 / 舒 伸

版式设计 / 延 河

出 版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1/32

印 张 / 8.25

字 数 / 20 万

版 次 /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3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730-128-7/C4 · 3

定 价 / 20.00 元

目 录

导 论 人类汇聚与现代文明 /1

- 一、问题的提出 /1
- 二、人类汇聚的历史图式 /4
- 三、人类汇聚的要素及基本形式 /10
- 四、城市化:现代文明生成的典型考察 /15
- 五、人类的全球汇聚及文明的当代挑战 /24
- 六、应对中国与上海的人口集聚趋势 /31

第一章 人类汇聚的动因与流向 /36

- 一、人类汇聚的相关理论 /36
- 二、人类汇聚的动因分析 /42
- 三、人类汇聚的方向考察 /52

第二章 中华文明发展的脉流 /59

- 一、汇聚与中华文明 /59
- 二、近现代中国的人口集聚 /73
- 三、汇聚与中国的现代化 /79

第三章 近代上海城市的形成与演变 / 81

- 一、上海由来 / 81
- 二、上海开埠 / 83
- 三、八方聚来 / 86
- 四、人群结构 / 90
- 五、崛起动力 / 92
- 六、社会变迁 / 95
- 七、海派文化 / 100

第四章 新时期上海的人口汇聚及其动力 / 103

- 一、变迁与流动 / 103
- 二、战略与环境 / 108
- 三、结构与空间 / 116

第五章 汇聚与上海城市社会的区位结构 / 128

- 一、汇聚与社区空间:人文区位学范式 / 128
- 二、城市现代化与人群汇聚的区位分布 / 137
- 三、新时期上海人口区位结构的形成机制 / 151

第六章 高密度社区: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 / 160

- 一、城市化与高密度社会 / 160
- 二、上海的高密度社区及其社会问题 / 168
- 三、高密度人口与社区的变迁 / 176

第七章 高密度社区的群体行为与文化特征 /187

- 一、汇聚密度与个体心理—行为的变化 /187
- 二、集聚区域的群体氛围及群体行为 /195
- 三、高密度社区的文化生成及其特征 /202

第八章 上海高度密集型社会的管理与控制 /209

- 一、城市汇聚的限度 /209
- 二、上海的城市容量 /216
- 三、政府“利维坦”触角 /222
- 四、社会“草根情结” /230
- 五、社区“心理认同” /234

第九章 汇聚与上海城市文明新趋向 /240

- 一、20世纪上海人的个性发展 /240
- 二、在汇聚中拓展的都市胸怀 /245
- 三、海派文明的当代发展及其趋势 /249

后 记 /257

导 论

人类汇聚与现代文明

人们之所以感觉到今天的世界在逐渐“浓缩”，这固然与通讯、交通的发达，人口的高速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关，然而，这里更与一个最一般、最基本的社会状态和社会运动相关联：这种状态和运动从人类初始，一直延绵至今，并日益外显化，这便是“人类汇聚”(human convergence)。“汇聚”的意义与会聚、聚合等一类词汇相近，而“人类汇聚”不单纯指人口的集聚，而是指包括人口集聚在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总体整合，它体现了人类在长期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趋势。人们通常在考察人类学、生态学、人口学及社会发展史时，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有可能忽略从总体上把握人的行为的这种自然趋群倾向及社会特质，以及对人类文明(civilization)发展的重大关系，这正是我们试图探询的出发点。

一、问题的提出

在自然与物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动物之间，特别在人对同类间的相互认同是一个起码的前提。“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

的存在物来对待。”^①这里,人成为普遍的存在物,而不同于动物是单个的存在物。人对于自身的感知的需求,作为有主体意识的人,对他人,即认知对象的人的映射,反照“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达到对自身存在的肯定与对他人存在的认同,从而相互依存,相互靠拢,结伴成群,这是人从自然属性向社会本质转换的前提。可以说,人的社会性的获得,就是一个脱离动物性的单个存在物,向类的存在物进步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形成和进步,就是“结伴成群”,走向汇聚的过程;没有这种汇聚,就没有人类文明。

一般地说,所谓汇聚,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条件内人的活动趋向和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基本的物质运动——复杂的社会运动这一系列相互连结的链条上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向心”或“离心”交替并逐次递进的社会流变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聚合——流散——聚合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的运动和存在状态,往往决定了物质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性质,从集涓流为江河,聚沙石成山峦,到化学的聚合作用(*polymerization*)、生物的集群行为(*aggregation*),到原始动物种群的形成,都体现了这一矛盾的意义。没有个别的、散在的物体的集聚,就不能形成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而任何个别、散在的物体,又是由更微小的物质集聚而成。人类社会的形成,就是一个从分散到汇聚,聚散更迭,并逐渐走向汇聚的过程。最初,生物,特别是动物的集群行为,体现了其生存本能的需求。原始人类与他们从脱胎而出的动物一样,开始通常选择那些资源较丰富,地理条件较适宜,能避风雨和猛兽侵袭,便于狩猎和觅食、安置巢穴繁衍后代的地方,结成共同生活的群落,从事必须由众人才能维持生计的劳作,这是一个从自然汇聚到社会汇聚的过程。由于血缘关系、继嗣群或其他因素组成的群落或氏族,开始都带有原始的质朴的动物集群倾向,从一种无意识集群行为到

①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转换。涂尔干(Durkheim)称之为“群体精神”,“集体习性”(collective habits),群体成为“若干互动的具有特定人格的个体的集合”(E. W. 伯吉斯)。

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汇聚与人类进化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前者着重描述人类活动的外在趋向,后者着重指出人类的内在变化和进步。劳动是人类汇聚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劳动中,出于欲望和情感交流的需要,促使了语言的发展和人的智力的发达。生产工具的改良以及最初物物交换的需要,使群落和群落之间的交往开始被赋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模式。而艺术(绘画、音乐、舞蹈)、图腾和原始宗教的形成,则大大推动了群体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精神—文化的交融。

最初人类的社会活动,如狩猎、祭祀、交易、战争等都意味着出于不同需要而导致的人口集中,这种集中体现的是人的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人口实质“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①。狭义上的人类汇聚主要是指在有限范围内人口的集中,而广义上的汇聚则是以人为中心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的总汇。完备的汇聚论应是狭义与广义的统一。人口的集聚,不是单纯量的积累,即人口数量的增长和集中,而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质变过程,它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一点,从“市”与“城”形成到现代城市化的进程都可以看出,因此而带来的经济昌盛,技术进步,文化繁荣,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无不与人的汇聚相关。即便是由于资源、地域或各种政治因素引发的冲突、分裂和战争,即使人们失去家园,流散各地,颠沛流离,也终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并实现新的重组和整合。

人类汇聚与文明发展的相关性,实在是潜隐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广义社会理论中十分重要而又尚未引起重视的一个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在命题。某种意义上,正是人类向以城市为典型的一定地域空间集聚,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相伴生,引发制度、文化的聚变或裂变,才最终在“文明”的意义上导致人类行为乃至本能的改变。可以说,人类文明史中血与火的洗礼、冲突与融合的交替、痛苦与欢欣的相随,大都与人类群体性的汇聚有关。

二、人类汇聚的历史图式

在自然界,物质在地壳运动中因相同的性质和密度而同类凝聚,生物用类聚群生的方式适应或对抗严酷的自然选择;动物更在自身的群落中本能地生发出严密的群体生活规则。从动物(猿)到人的进化,是自然发展的一个飞跃,却并非自然选择规律的中断。人类创始,不是源自传说中某个人类始祖的个人突变,而应当看作在猿人群居本能基础上的群体性演进。这种演进越是达到较高级的阶段,原始质朴的动物集群倾向就越是转化为人的有意识的汇集与结合,本能的动物集群行为就越是为人类自觉的社会建构所取代。于是生产方式不断更迭,制度与文化不断创化,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制约人类汇聚的方向、范围、速度以及最终的群体结合方式等等。从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进程,同时也呈现为人类聚合激荡的复杂图式。

人之为人的过程,是灵智不断发展,社会属性逐渐超越自然属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灵与肉的冲突、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对立,常常现实地存在着,但是这种矛盾与其说是人类需要摆脱的困境,不如说是驱动人类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的动力,因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①。人的肉身是性灵的物质依托,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要素和根基,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0页。

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自然属性实质是人的趋群倾向的内在原因,同时又是促使人的社会属性形成的驱动力。从本能的趋群性到有意识的汇聚,是一个逐步社会化的过程,这不仅沉淀在人类历史演化的深层,而且同样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一切生物活动的基点,都在于维持生存的需要。人为了生存,第一必须获得满足肌体需要的物质,第二必须结伴成群。越是回到历史的起点,我们就越能够明确,汇聚不仅是人为了获得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而结成群体力量的谋生手段,同时还是人类天然的存在方式。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分别形成物质生产关系和人自身的生产关系两个范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人的生存状态),“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①。在从动物本能地采集自然果实向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转化的时代,物质生产实践被血缘关系所遮蔽,人类存在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基于自然选择的人自身生产过程及其关系。与此相应,血亲关系是人汇聚成群体的第一个纽带,血族群体是人类存在的事实单位。这时,个体从属于实行群婚制的血族,要脱离一个族群而汇入另一个族群是非常困难的。但从动物那里继承下来的对一定自然领地的占有,使相邻血亲人群之间在接触、冲突和侵夺中,一面形成着他群和我群的群体意识,一面在扩大的空间中实现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汇集与融合。可以想象,原始人类这种以群体为单位的汇集,在那些自然资源较丰富,地理条件较适宜的地方是并不鲜见的。

扩大了群体需要扩大的物质资料,人从接受自然的恩赐转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创造和生产,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劳动。这种状态,在分配中促成了个体意识的确立,在劳动中促进了个体与个体之间协作的需要,并使人从动物本能的集群进一步“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①。于是生产关系作为人类汇聚纽带的地位被突出出来,基于血缘的自然汇集开始转向基于生产实践的社会性汇聚。由此而来的冲击,导致原始血族群体内部分关系的变化,从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血亲婚配逐步受到限制。当一切兄弟姐妹之间婚配的禁例确立起来,原始血族就转化为氏族了。这时,原始一体化的血族开始变得更像以家庭为单位汇集而成的亲属组合。随着财富的增加和家庭日趋稳定,以自然分工为前提的母权制原始共产经济被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经济所取代。出于父亲财产继承的需要,人类历史进入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形式阶段,它不再以自然选择为前提,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家庭私有制的确立,是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

家庭私有制的意义在于,它使个人不仅作为消费者,更作为劳动力的观念得到强化;同时,它又使人类从血亲群体中解放出来,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由迁徙成为可能。这是人类打破血亲界限,进行更大规模汇集的前提。与此相伴随的是,原始社会末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交换成为可能;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到来,则开始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及其贸易活动。在这里,基于生产的农业群落,基于交换的市集出现了,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作为人类群落汇集的纽带进而最终确立起来。氏族解体后脱离出来的家庭,自由民、逃脱出来的奴隶,在平原地带汇聚成村落进行农业生产,在交通便利之处汇成市集从事手工制作和商业贸易。村庄与市集的出现,无疑使人类迁徙和汇聚获得了稳定的空间结点。正是有了群落规模与自然环境的稳定关系,人类社会的生产

①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2页。

方式、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包括风俗、伦理和以国家为依托的强制性规范才得以形成并最终结构化、系统化起来,人类汇聚的要素和图景才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从而人类汇聚就超出了人口学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概念,包含了一定空间范围内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所有活动状态。

当家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出现的时候,家庭首长的财产差别也就出现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分离。因此,贫富差别最初不仅包括拥有的物质资料的多少,还包括可支配的人口即劳动力的多少。在群落内部的分化以及群落与群落之间的征讨杀伐中,掠夺人口成为常见的现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暴力和强制为手段的人口集聚,并且以奴隶制国家的方式制度化起来。奴隶主梦想着把越来越多的奴隶集中到自己的工场,国王则希望拥有更多的疆土,管理更多的子民以及奴隶。因此,在奴隶制时代,战争的目标不外乎土地和包括人口在内的财产。这种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人口集聚的方式,几乎延续在其后人类文明史的全过程。中国封建时代的历次大规模强制性移民,填补了两广、云南、四川等地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和减少的人口,也稳定了国家边疆;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则把农业人口强制性地纳入工厂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在血与泪的剥夺中起步腾飞;美国政府引导的西进运动,则为这个国家开拓出了半壁富饶的疆土。在现代社会,国家有目的的移民,仍然是进行人口管理、调控人口分布的重要手段。所不同的是,从暴力到引导,使用的手段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变得日益文明。

恰恰是在贫富分化和国家制度化安排中,个人和家庭具有了社会意义的身份、地位和声望,这些要素一方面把个人与个人进一步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则又把入划分成不同的“类”。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们,创造着不同的亚文化,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习

俗,也享有不同的社会评价。在这样的基础上,同类相聚的社会习性,在同一社会内部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一个城市的空间分布,总是自然地形成同一阶层汇集的居住区,从集市商店到各类社会活动场所,出入人流总是以某一阶层为主,直到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其婚姻组合在现实中也依然以相同地位和背景的男女结合为主流。原因在哪里呢?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具有相似地位的人们,才更容易开展相互之间的交流,更容易达成相互间的认可和同情。而同类相聚,相互结成邻里和朋友群体,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来说有助于抵消阶层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压力,对地位较高的人来说则有助于增强其社会优越感,优化其生活方式。因此,就动因而言,同一阶层的人群汇聚,是由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认同促成的。由此形成的以文化为导因的汇聚现象,在跨文化移民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华人在海外汇集成成的“唐人街”、“中国城”已经众所周知,日本、拉美移民在欧洲和北美各地同样结群而居。他们的集聚区不仅延续着自身的母文化,为移民在陌生空间中生存提供精神支撑,而且因此吸引更多新移民加入而呈现“滚雪球”式的扩大。一般而言,跨文化移民的母文化与移入地文化的差异越大,就越容易出现同类汇聚的区域,这在移民文化交流中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

制度的、文化的原因导引下的人类汇聚,并不能掩盖物质生产活动这一人类汇聚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它们也正是人类在劳动协作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扩展或者变相,因而仍存在于人类出于自身生存需要而汇聚的“自然历史过程”之中。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本身”^①。当这一动机确定下来之后,在哪里生产,如何生产,就成为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农业社会及其以前的时代,受制于较为低下的生产能力,人们首先追逐较为适宜的自然生存和生产环境,水源充沛、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适宜的平原河汉地带,就成为人类汇集的首选。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华文明这古代人类四大文明,都诞生于这样的地理环境之内。当商业发展起来,人们又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汇集成市,地中海滨的古希腊文明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资源导引的人类汇聚。实际上,商业文明的发达已经显示出人口集中所带来的潜在市场机会的价值;工业社会的来临,一方面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日益增多的人们得以脱离土地到其他行业谋生;另一方面又前所未有地促使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分离,就业成为十分重要的生存概念,就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资源。对商业和就业机会的追逐,使地理条件适宜的地方人口汇聚数量产生加速度的增长。工厂集中、商店集中,工人集中、顾客集中,原来的村落或市集就膨胀为现代的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人类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期加速向城市集聚的现象,西方学者已从人口学的角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试图发现其中的规律性,并提出各种解释。最早的是迁移规律论,E·G·雷文斯坦在1889年就列举出七条人口迁移规律^①。接着,W·彼得逊提出了从远古到现代各种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作用的人口迁移模式。但这些宏观的描述很难用来解释某些具体的事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越来越看出,人口迁移实际上是劳动力在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市场配置。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劳动市场论的解释,例如推拉

① 七条迁移规律分别是:1)迁移率同迁移距离成反比;2)迁移是分阶段进行的;3)每个迁移流都存在一个反向流;4)净迁移人口通常都存在一个反向流;5)女性在短距离迁移中占优势;6)技术和通讯发展增加了迁移量;7)经济是影响迁移的最重要因素。

理论、期望收入理论、二元经济理论等,这些理论都肯定人口迁移存在规律性,经济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重要因素,但并未对人口迁移的最终结果即人类汇聚给予应有的注意,从而也就缺乏理论的穿透力。

三、人类汇聚的要素及基本形式

历史的考察业已表明,生产活动,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是人类汇聚成群,结合成社会的轴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类不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劳动,而且只有进入群体生活才能获得劳动的机会,扩大生存方式的选择范围。在一定的空间范围,生产力是人类汇聚的物质基础。主导人们迁徙与汇聚的动因由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变更和丰富;其集聚人口的范围又因交通、通讯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扩大,人口汇集的速度和流量也相应地不断增长。而当大量人口在一定空间集中起来,又是既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活动的组织形式、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方式,进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群体结合的制度架构,并沉淀为文化内涵的核心。在这一点上,需要强调,人类个体的数量汇集,仅仅是社会有机体形成的开始,而不是其完成;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同一空间,既不一定意味着他能够稳定地生存下去,也不一定意味着一个聚落的稳定存在。因此,人类汇聚的研究不能等同于人类迁移的研究,它固然要关注迁移的过程,但必须将研究的重心归结到迁移的空间结点,即人通过迁移汇集到的同一空间范围以及在这一空间内所发生的社会聚变,包括各种社会要素的积累和变化。

人类汇聚以人口集聚作为中心环节,内含迁移——集结——聚变的全过程。时间、空间、人口是其外在要素,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生成是其内在要素。各种要素的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类型。关于人类汇聚各种动因的描述,实际上已经涉及人类汇聚的类

型学分析,但当重心转向一定时间条件下的集聚空间,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这里,人口与时间的组合,形成速度;人口与空间的组合,形成密度,这是考察人类汇聚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指标。

(一) 机械性汇聚和自然性汇聚

人口在一定空间范围集聚,直接导致该空间内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考虑人类汇聚对于生存空间的选择性,那么该空间内原有人口的定居繁衍已经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选择。因此,一定空间范围内人口规模与密度的变动,必然起因于人类选择的两种结果。所谓机械性汇聚,是指人口通过迁移从不同地域汇集到相同空间,导致后者人口规模扩大、密度增加。所谓自然性汇聚,指的是人口未经空间迁移,而通过自身的生息繁衍,导致所在地域人口规模扩大和密度增加。任何地域人口规模的膨胀,都是人口机械性汇聚和自然性汇聚的共同结果。但早在欧洲工业化时期,就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城镇的出生率是低于死亡率的,因此它“不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由移民形成的”^①。可以说,人类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源于人口的机械性汇聚。

(二) 结构性汇聚与功能性汇聚

从一定地域人口集聚的内在原因看,既有外部人口的自觉意愿,也有这一地区对于人口的内部需求,而这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生产力的变革和现代化的推进总是有先有后,逐步传播。经济发展在空间布局上的不平衡性是常在的,当经济中心和外围的差别性出现,人们就会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这是由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带来的人口结构性汇聚。但一个地区的率先发展,又总是同时产生对人力资源和市场容量的需求,从而主动吸纳具有某种特定素质的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这

①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49页。